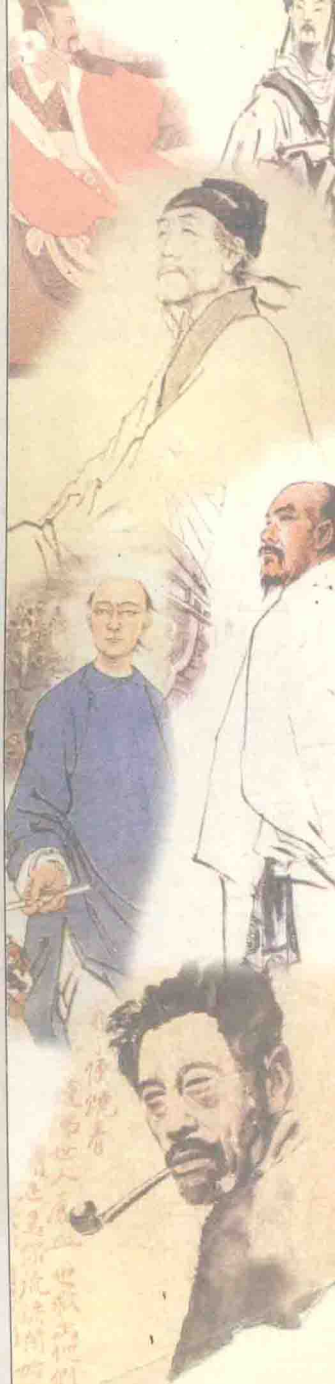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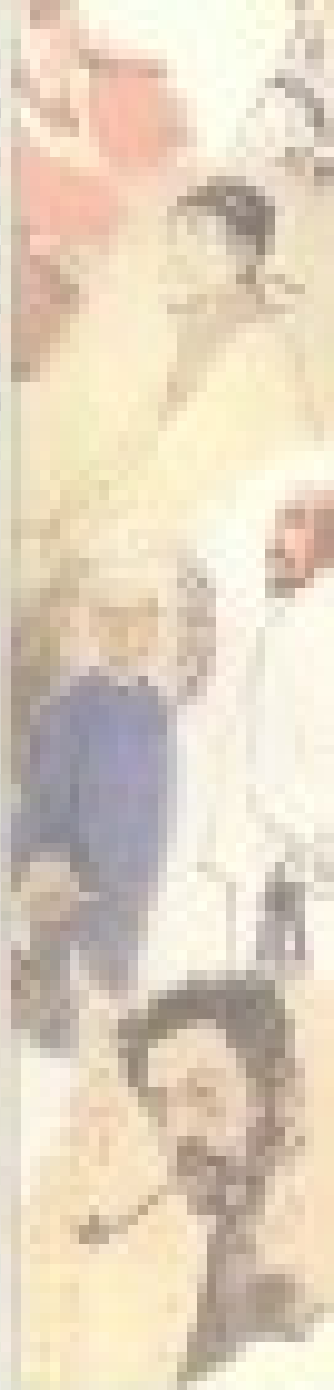
陶渊明

胡海 编著

海南出版社



陶淵明



中华历史名人

陶 渊 明

胡 海 编著

海 南 出 版 社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

主 编：刘文武

责任编辑：李秋云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社 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 2 号

印 刷：河北省保定市西城胶印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79.625

字 数：3884 千字

版 次：1997 年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套

ISBN7—80617—737—X/K·39

定 价：（全套 50 本）总定价 225.00 元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编委会

主 编：刘文武

副主编：蒋卫杰

编 委：马丹梅 葛 兰

丁 兰 刘 力

邓先明 于秀杰

邵 战 齐小平

目 录

乱世出奇才	(1)
宦宦世家	(7)
乞食少年	(10)
初仕归来赋闲情	(15)
再奔仕途	(22)
居丧躬耕	(27)
三仕刘裕	(34)
不为五斗米折腰	(42)
归园田居	(49)
天灾人祸自悠然	(56)
独步高士之林	(64)
酒中隐士	(74)
桃花源	(85)
易代悲歌	(91)
金刚怒目	(98)
死如之何	(104)
千载有余情	(109)

· 乱世出奇才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别号五柳先生。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既是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崇高的大诗人和大散文家，又是歧见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引人注目之处一在于他的五度出仕而后坚隐不出，二在于他的诗文冲淡清雅、天然纯真而又偶现豪壮之气，三在于他的长期被埋没而后又被奉为一代宗师。

多年来，陶渊明作为人们心目中才华超卓，情志雅远，旷群脱俗，率真任情的文学奇才和士林怪杰，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只有从陶渊明所处时代环境入手，审视他的心路历程和诗文道路，才能够予以更全面、恰切的评判与显扬。

奇才怪杰的诞生，常常有赖于两个条件：不平凡的时代，不平凡的人生。正常的时代普通的人生，人的思想融入生活之流中，不会有多余的意识来反观生命本身。只有在得失、成败、荣辱、幸运与乘蹇之中惊喜、向往、痛苦、迷惑，在心理的不平衡中追求和谐，又从和谐中产生新的裂变，这才有了美到极致的情感和意绪，有了深到极致的哲理认识，这才

产生了诗人、作家、哲学家。所谓愤怒出诗人，痛苦出哲学家，就是这个道理。人之所以超越于凡人，并不是因为天赋灵气，所谓“天才”只是一种美誉，一种羡慕，归根结底是由于后天的不平凡的经历，不同于一般人的主观追求与客观砺炼。而时代，则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人的心态和生命历程，将其不平凡加诸于个人，并常常以文学或哲学的形式体现出来。这就是乱世出奇才的必然性。

陶渊明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东晋王朝中度过的，晚年经历了晋宋易代。他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大分裂、大混乱的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争频仍、祸乱不已，陶渊明降世之时，西晋灭亡已 48 年，东晋偏处一隅，时时受到北方的进犯，统治集团内部却并不励精图治，团结御侮，更不思收复失地，而是沉湎于江南鱼米之乡的安乐而不能自拔。大批兵权在握的将领，多以扩展个人实力、相互勾心斗角为能事，致使少数爱国志士如祖逖等发起的几次北伐复土运动，都半途而废。所以青少年时的陶渊明，虽然也曾经“猛志逸四海”，也曾经“抚剑独行游”，却终于报国无门，建功无望，终于选择了田园。公元 383 年的淝水之战以东晋大败前秦告捷，但外患稍缓，内乱继起，这就是公元 399 年爆发的历时十二年、波及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孙恩、卢循大起义。义军与官军的长期战争，给劳动群众带来更大灾难。陶渊明的故乡江洲浔阳是京都金陵的屏障，为兵家必争之地，遭受战火的毁坏更为惨重。陶渊明的诗文中对这次战乱虽无直接描写，但触目惊心，他的悲观、避世的情绪，他的桃花源理想，都因此油然而生。

外患内乱使人们连生存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展其才志了。

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更是令一切有识之士失望、厌倦。陶渊明一度在桓玄手下为吏，后又入刘裕幕府中任镇军参军，亲睹了一帮野心家们争权夺利、犯上作乱的一幕幕，其心中那种不齿而无奈，渴盼远离尘嚣的情绪可想而知。陶渊明是在数番入仕过程中认识到他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无从在这个动荡不堪的时代实现的。所以他才最后下决心归田。这既是一种消极退避，也确实是无可奈何，是无力回天的情形下做出的明智抉择。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孔子那时还是能够有所为的，而陶渊明非退避不得免祸消灾，非隐居不能独善其身，以其才，以其情，以其时，他实在是除了吟诗作赋，再也不能别有所为了。

历代文人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都要首先考虑通过仕途来实现。子曰：“学而优则仕，”当官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问题是看做什么样的官，是为人民鼓而呼呢，还是只知溜须拍马。文人笔下厌官憎宦之声颇切，这只是因为官场黑暗，或者是才违其时，求官不得，及为官而不得尽其心志。苏东坡几番为太守，做了不少好事，至今在西湖、海南、密州、黄州留下美名胜迹；韩愈官至侍郎，忠言直谏，几番遭贬，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这样为官，堪为宦官之人的楷模。他们的才华与心志，也正是通过出仕来实现的。陶渊明虽然最终做了隐士，但假如他一开始就不入仕途，他的为人、为文也就不会有那么奇丽的魅力。他的辞官、谢聘，正是因为当时官场黑暗，仕途艰难，以其门第，以其心性，不可能左右逢源，飞黄腾达，得不到大展宏图的机会。东晋一代，在选官制度上，是沿用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将人按才能、德行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

下下九品，按品级授官，实际上是不讲德才高低，只看士人祖籍，以维护士族门阀的地位。腐朽落后的官僚制度堵塞了一切才华之士进取的机会，使他们的政治抱负毫无实现的可能，这就是陶渊明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也是他终远朝市、寄意思园的最深刻的原因。在这样的时代，出现陶渊明这样的隐逸诗人，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话不仅适用于梅尧臣，也适用于古往今来许多才志不得施展，心中有所郁积的诗人。陶渊明正是因为报国无门，立功无望，在上下求索中陷入穷途末路，悲守寒庐，这才以诗文为寄托，忘情于田园，以恬淡解忧愤，化平凡为真趣，而成一代宗师。

东晋作为一个变乱的时代，思想意识上也是混乱错杂的，各种思潮、观念激烈交锋，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相互驳难，当时儒学的正统地位已经丧失，礼法被指为流俗，纵诞被视为清高，儒家严谨、务实、积极进取的精神已经泯灭，代之而起的是崇尚清淡的玄学。士族阶级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约束的纵欲享乐生活，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同时还以清淡高妙的玄理来点缀风雅，炫耀才华。陶渊明视十三年仕途为“误落尘网中”，自谓“性本爱丘山”，也是受当时流行的老庄出世思想影响的。

两晋的玄学家，有的主张儒道调和，如郭象的自然与名

教合一说，目的在于论证现行制度的合理性，有的则认为只有“无君无臣”的古代社会才是人民安定富足的乐土，这就是鲍敬言的“无君论”。陶渊明作为一个小私有者和失意文人，在对现实绝望之后，自然会认同这种思想，于是他笔下产生了一个美丽迷幻的世外桃源，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心驰神往。

玄学与当时正在日渐发展的佛教在虚无空幻的人生观、世界观方面是相通的。这正是当时人们理想崩溃、信念迷失、心灵空虚的普遍反映，当时帝室和士族中很多人都信奉佛教，社会上遁世超俗、出家为僧的现象非常普遍。陶渊明的思想认识也抵御不了时风世尚。他的归返田园与他人的出家为僧殊途同归。但是，从其“形影神三首”，可见他不同意佛教虚伪的形影神不灭论；从其“结庐在人境”，可见他更关注现实，关注此生；“心远地自偏”则表明他能进能退，落于尘中超物外，这才是有志有识之士在任何时代任何处境中的不凡姿态。

文学的兴盛与发展是受社会经济、政治与社会思潮的变革和发展所影响、制约的。由于社会的动乱，玄风的盛行，东晋文人竞尚浮诞，驰骋玄理，“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坛逐渐为玄言诗所占据。晋末宋初，老庄思想稍歇，佛教哲理又被许多方丈诗人引入文学创作。当时文坛领袖许询、孙绰的创作，就是玄言、佛语满篇的劣品，“平典似道德论”。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空虚、文学贫困的年代，陶渊明融其傲然不群的个性于诗中，给晋宋诗坛带来一股清新风气，正因他真正有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卑躬屈节的骨气，他的诗文才能力转时弊、别具一格，正因为他隐身而不隐心，仍然关注现实，所以他的诗文才能于轻描淡写中显出风骨，具有丰润饱满的内核，他的不事雕琢，作为对执意求理、强作高深的创

作流俗的一种反正，因而也具有了深远的意义，对以后反形式主义和反矫情伪智也是一种现成的样本和生动的教材。当世的曲解埋没不了陶诗的特殊魅力，相反，这更加显出了他的卓绝，更加令后人敬仰而充分挖掘出他的浅近的诗句中蕴藏的真情真趣与真意。今天，陶渊明这位兴起于乱世，被乱世所掩盖的奇才怪杰，已当之无愧地被认定为是建安之后、盛唐以前的最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万众瞩目的星斗之一。

官宦世家

在讲究门庭家世的东晋，吹嘘自己氏族传统的高贵是制造舆论、抬高身价的妙法，甚至可以藉此博取功名，所以夸宗耀祖一时成为风尚。陶渊明也未能免俗，在《命子》一诗中，他将家谱上续唐尧、虞舜，将西周司徒陶叔、汉右司马陶舍、丞相陶青都纳入本门。这种追溯远祖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十分可笑，但也不难理解，除了东晋高度重视家谱学的时尚影响，古往今来，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希望自己是出身高门，祖宗有德，因而倍增豪情与信心呢？尤其那些不甘平庸的人，总想为自己找到一些不凡的预兆、暗示及天命，不凡的先世就是对自己前程的一种预兆，一种暗示，一种因果轮回的天命。虽然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慰，可它对于促人上进，不甘沉沦无疑是有良好影响的，一个看重自己、有所追求的人，必然崇拜祖先，正如一个自尊自强的民族必然看重自己的历史与传统一样。无独有偶，屈原在《离骚》中也尽情地夸耀自己出身的不凡：“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热爱祖先，实际上是一种自珍自爱的表现。所以屈原、陶渊明都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特立独行于世。另外，《命子》一诗是陶渊明初得长子俨时所作，历数陶门功德，正是为了

抒发自己救世济世、建功立业的理想，也是慨叹自己早生华发，一事无成，希望儿子将来成才，完成父志。夸宗耀祖既是一种自我激励也是一种自我安慰，是信心不足时的寻求补偿，是自怨自怜的变形表达。这亦如一个民族，在落后于其他民族时，只有以缅怀光荣历史来自励自慰，而蓬勃上进的人，是不会说“老子先前比你阔”的，陶渊明的述祖，既有不甘沉沦的一面，也有消极无奈的一面，他后来的无功而退，从洁身自好这点来说是值得赞赏的，从“灵台无计逃神矢”，放弃与命运的抗争这点来说则仅是值得同情和叹惜的。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后徙家庐江之浔阳。侃出身孤贫，以军功而达显贵，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陶侃泽被一方，家境也豪富一时，“滕妾数十，家僮千馀，珍奇宝货富于天府。”应当说，曾祖的政绩、政声与其家室的昌盛、显赫，都是让陶渊明追慕的，这是与他一生数次出仕互相关联、不可或缺的两因由。

陶侃亡故后，其子嗣或因罪被诛，或自残而歿，衰败相继，家境急剧沦落。陶渊明祖父陶茂虽也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太守，但没有什么事迹流传下来，既然陶渊明说他是“直方二台”，以梗直方正闻名，必定在官场上混不圆转。陶渊明父亲陶逸，是否做过安城太守今尚存疑，陶渊明赞他为官不喜，去职不怒，似可看出陶逸更是不得志，不喜不怒与其说是天然心性，不如说是自我安慰、自我支撑的一种姿态。陶渊明对陶侃以上的先祖都具体提到职位，谈起他父亲时却非常空泛，估计是其父职位卑微，耻于言及。加之陶逸去世很早，到陶渊明一代，败落困窘之状可想而知。陶渊明无亲兄弟，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振兴门庭，延续香火，扶老携幼的

职责系于一身，这远超大济苍生的逸志要来得实在，要留得长久。陶渊明迟迟不仕与家事牵累不无关系，二十九岁后数番出仕，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在有所作为的同时能够养家糊口、重振门庭。

陶门承陶侃爵位的嫡系子孙最初是其子夏，后经侄陶弘、弘子绰之，传至绰之子延寿。延寿曾随刘裕征讨后燕慕容超。延寿过浔阳祭祀陶氏宗祠时，陶渊明与其相会，作《赠长沙公》诗赋别，赞美陶延寿不辱门庭、无愧祖先的同时充分表露出他对长沙公的企羡以及自愧自怜。伤感第一代长沙公的威名与盛德在自己身上难以再现。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被都督六州诸军事并领江、荆、豫三州刺史庾亮保举为儒官“劝学从事”，又作为征西大将军的长史。孟嘉的妻子，是陶侃的第十个女儿。他的温雅平和，飘逸潇洒，对陶渊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除同父异母妹妹外，还有两个叔伯兄弟：仲德、敬远，都无所作为。综括地说，陶渊明出身于一度辉煌而急剧败落的官宦世家。他一面想要恢复先祖的光荣，一面又感到时运不济，力不从心，一面厌弃官场的纷乱芜杂，一面又忘怀不了曾经有过的繁华。所以他才在进退出隐之间有如此多的犹豫，如此多的反复。最后他终于不能从仕途上看到光明前景，这才决然离去，留下无穷感慨，无穷怅惘，而终于觅得了恬静心境，创造了另一种繁华，那种不会被时代淹没、不会随时光飞逝的繁华——文学上的卓绝成就。

乞食少年

陶渊明的早年生活，在人们印象中，是如他自己在《与子俨等疏》中说：“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因为家贫而到处借贷，可见多么困窘。陶渊明经常陈述自己的贫穷困窘，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洪迈《容斋随笔》所言：“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瓶无储粟；其寒，则短褐穿结，絺绌冬陈；其居，则环境萧然，风日不弊；穷困之状，可谓至矣”。陶渊明的自述，当然是据实而言，有感而发，但一旦形诸笔墨，便难免渲染夸张，这不是惑众乞怜，而是文学反映生活的一种方式。但他这种着意渲染的笔墨，却使人们对他的生活状况的估计远远脱离他的实际水平。唐代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说陶渊明“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渐也”。

对于陶渊明的经济地位，既不能仅凭陶渊明诗文自叙，忽视文学描写与实际状况的距离，也不能从君子固安贫乐道的观念出发，将对陶渊明人品的敬仰与对其窘况的同情混淆不分，仿佛陶渊明只有和农民一样在饥饿线上挣扎过，方更显出其高风亮节，仿佛平民地位、平民立场能增添他诗文人品的光彩，使诗人的形象更加伟大。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不

同时期的生活状况，分析他不同时期的心理与行为，理解他不同时期的作品。目前存在的误区有五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穷益显坚贞，所以宁愿他是一生贫寒，并为此寻找依据；二是陶渊明的大多数诗文名篇作于退隐之后，家境日衰，诗文中穷气日盛，怨气日浓，所谓文穷而后工，他的生计与创作都经历了一些转折，不能由后期诗文中的自叙贫状而得出他一生困窘的印象；三是贫富没有固定的标准，只是相较而言。陶渊明温饱难持的日子并不多，较之当时的达官贵人，较之陶侃、陶延寿，他自然是贫穷不堪，可是较之许多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农民，他还是优裕有加的；四是陶渊明晚年的诉穷，也是悲其命运之穷，穷途末路，状生计之穷而泄其心志难展的郁闷，假如仅仅是生活的穷苦，又有什么好大书特书的呢？今人从中欣赏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失意、落寞，而只是温饱难持的哀怜，那又有什么艺术美感可言？五是历代论陶，常常为论证某一观点或从某种观点出发，具有一定随意性，其结论不足为今人凭据。

王维举《乞食》一诗为例，说陶渊明经常乞讨，“叩门拙言辞”是写其难为情之状。“乞食”二字仅从字面上看确实很能迷惑人。一些人说陶渊明晚年穷得“沿街乞讨”，就是从这个诗题的字面意义附会出来的。诗人晚年更贫苦，所以一般认为这道诗系晚年之作。但是，一者，《乞食》一诗作于“投来去学仕”之前，写的是陶渊明出仕前“东西游走”的情景，由“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一句看，他此时正是一个欲有所为的青年，二者，作《乞食》诗时，作者大约二十七八岁，时南方连年饥荒，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暴雨成灾，其后两年大面积蝗灾，陶渊明早年丧父，又无长兄，在青黄不接时向他人求借，也不是太